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6.020

“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 表征、归因及治理

杨芸伊^{1,2}, 赵惜群¹

(1.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2.怀化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摘要:从“纸媒”到“智媒”的技术之变、从“真相”到“情感”的逻辑之变,昭示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其以情感主导真相的传播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理性坍塌、信任弱化和认同偏差等隐忧。在此背景下,网络政治谣言从形态、主题、内容和话语等方面畸变出与“后真相”时代相适的多重表征,并在利益勾连、技术加持、治理博弈和信任流失等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借机滋生和蔓延,严重削弱了网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亟须从事实与情感的逻辑澄清、制度与技术的协同规制、价值与文化的柔性沁润、规则与话语的理性建构等角度破解“后真相”时代的治谣难题。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基本表征;归因透视;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D643;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6-0151-07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确立 and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但“必须清醒看到……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①。“后真相”时代演绎出“情感优先、事实滞后”的倒置逻辑^②,模糊了真相与谣言之间的界限,极易遮蔽客观真相、动摇政治信念、引发意识形态风险。为此,深入探讨“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表征、归因及治理,对驾驭“后真相”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和挑战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 “后真相”时代引发的求真隐忧

真相是客观事件的真实状况,即通常所说的事实。“政治谣言是造谣者根据特定的动机和目的散布,并在民众中得以广泛传播的一种内容没有得到确认、缺乏事实根据,或虽起之有

因但严重失真,甚至是故意、恶意捏造的社会政治信息。”^③网络政治谣言则是政治谣言在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以网络为传播介质的毫无根据的或严重失真的政治信息,惯以诬陷、攻击和诽谤等手段,攻击政治人物、政治集团或具体政策、政治主张^④。面对网络信息过载引起的证伪难题,理性探寻真相的成本远高于感性获取真相的成本,各种诉诸情感、主观建构的“后真相”现象层出不穷。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胜选等热点事件使“后真相”一词入选《牛津词典》年度热词,该词典将其定义为“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公众舆论”^⑤。事实上,“后真相”正在不断强化“情感优于事实”的真相建构逻辑,削弱了传统客观真相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引发了理性坍塌、信任弱化和认同偏差等隐忧,催生了网络政治谣言

收稿日期:2022-03-18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0A477);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YBX013);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和湘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220613)

作者简介:杨芸伊(1981—),女,湖南怀化人,博士生,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崔英超:《“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情感表达与治理》,《青年记者》2020年第26期。

③伍俊斌,等:《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8页。

④谢新洲,陈春彦:《网络政治谣言消解策略》,《人民论坛》2015年第34期。

⑤牛津词典有关“后真相”词条的链接:<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post-truth>。

的传播风险。

(一)情感因素淡化理性考证

古斯塔夫·勒庞曾指出:“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失败的从来就不是感情。”^①真相探寻同样面临着理性考证与情感渲染的冲突。前者侧重于运用理性分析还原事实真相,实现谣言证伪;后者侧重于运用情感体验,实施情感影响,进而改变人的认知和判断。情感和理性理应共同驱动事实真相的探寻,但在“后真相”时代,情绪渲染作用受到传播主体的热捧,不断挑战理性认知和客观标准的作用和地位,淡化了理性考证的效度。一方面,理性考证遭遇了信息过载的证伪难题。“后真相”时代网络信息内容的供给主体多元、方式多样、内容真假难辨,理性考证所需的认知资源远超个人的认知能力。网民置身于支离破碎、模糊难辨的诸多貌似真实的表象之中,逐渐失去了理性考证的耐心,满足于直觉和情感的主观判断和选择,呈现情绪优先、事实无涉的认知倾向。另一方面,情感体验在网络交往中得到无限扩张。媒介技术的发展激活了网民的视觉、听觉乃至多重感官体验,强化了情感体验在人们认知和理解事实中的作用,使人们逐步形成重情感轻理性、重体验轻逻辑的认知思维,使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主观性和情感性内容因其具有消除不确定性的价值,反而超过了客观性和真实性等内容,成为事实真相建构的主导因素,加剧了理性和情感的失衡,弱化了理性考证的价值和效度。

(二)圈群传播稀释权威信任

圈群传播是借助朋友圈、QQ群、饭圈等网络圈群社交载体,进行圈群内信息交流和思想互动的传播形态。“权威信任是指个体对权威可信度的积极信念”^②,包括对具有合法性的公权力,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权威的信任。“后真相”时代的圈群传播呈现高集群性、强排他性和弱受控性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人们对权威信任,给造谣祛魅带来挑战。首先,圈群传播的高集群性强化了内部的群体依赖,存在弱化权威信任的风险。网民基于一定的血缘、地缘、学缘、趣缘等相似性跨时空集结,通过互动交流逐渐形成内部集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旦内部集群受政治谣言所惑,集群依赖就可能放大

造谣效应,弱化权威政治辟谣的效度。其次,圈群传播的强排他性固化了内部信息传播渠道,存在消解权威信任的隐患。圈群传播的强排他性衍生出高同质化的特点,成员日益形成与外界区隔的信息传播偏好,可能阻塞异质信息的传播通道,使得权威信息难以影响渗透,消解了权威信任。最后,圈群传播的弱受控性制约了权威信任效用,存在权威信任流失的忧患。圈群自身的准入性、封闭性和排他性构成了异质传播的多重壁垒,增加了引领和监管的阻力,易产生权威信息辐射影响的盲点或盲区,为网络政治谣言的滋生和传播埋下隐患。

(三)价值偏见离散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③包括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政党、政府等政治实体的认知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认同。价值偏见则是人们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念,以不正确或不充分的信息为根据而形成的对其他人或事物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看法和态度,对政治认同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负效应。“后真相”时代推崇事实与情感的倒置逻辑无疑会放大价值偏见的负效应,产生离散政治认同的风险。首先,“后真相”作为一种舆论生产模式,不断地鼓吹差异性和矛盾性,在诱使人们运用标新思维生产各种“真相”的同时,也滋生了纷繁复杂的价值偏见,扰乱了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其次,“后真相”作为一种舆论传播模式,具有情感传播的偏好,使得关涉政治实体的某些负面信息更易于传播,加之各种价值偏见的推波助澜,对负面现象的过度渲染,极易破坏政治实体的形象,弱化受众对政治实体的认同。最后,“后真相”时代的舆论氛围纵容了价值偏见的渗透,消解受众的政治热情。“后真相”时代不但塑造了情绪化的舆论氛围,也塑造了网民情感化体验的信息传播偏好。在此氛围之下,嬉笑怒骂的各种价值偏见较之于权威严肃的政治信息更具有情感传播优势,一旦受众的政治认知模糊,就难以抵御价值偏见的隐性渗透,加之信息茧房、过滤气泡等固化效应,极易催生政治疏离和冷漠等现象,消解了民众的政治热情。

^①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②张书维:《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心理学报》2017年第6期。

^③闵绪国:《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0页。

二 “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基本表征

“后真相”时代引发了真相探寻的隐忧,网络政治谣言也顺势畸变,从形态、主题、内容和话语等多方面形塑出与“后真相”时代相适的多重表征,借以掩饰其蛊惑人心、乱政祸国的企图。

(一) 谣言形态:单一性向多样化演进更迭

当直白的政治污蔑难以网罗受众,网络政治谣言就由显性污蔑转向隐性感众,借用学术、文艺、政治、娱乐等多种形态迷惑受众。一是以学术形态“误导”,扰乱政治认知。敌对势力通过培育御用学者,假借学术研究之名,质疑历史定论,污损党和国家形象,不遗余力地杜撰网络政治谣言。例如,通过“新冠病毒溯源”“实验室泄漏论”等学术研究污名化中国;蓄意炮制“新疆棉花”人权报告、涉疆人口报告,实现反华政商学多元合谋,以谎言固化偏见,实现其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二是以文艺形态“惑众”,解构政治情感。制谣主体充分利用网络文化元素、艺术话语,恶意解读和夸大历史细节,丑化革命领袖、政党和英雄烈士,销蚀政治情感。例如,《方方日记》等作品蓄意通过新冠疫情初期武汉极个别官员失职失责等视角,假以文艺之策否定和抹黑党和政府,离散民众的政治情感。三是以政治形态“祸国”,歪曲政治事实。制谣主体借政策、通知等伪装形式,大肆散布网络党政军谣言,误解误读相关政策,营造社会恐慌,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例如,《疑似美国核潜艇在中国南海发生爆炸》等谣言聚焦军政要事煽动造谣;《中国监管部门推动在美上市中国企业退市》等谣言恶意解读政策,破坏稳定。四是以娱乐形态“离心”,弱化政治认同。制谣主体通过蹭热点、刷流量、打“擦边球”等方式迎合网民娱乐需求,用轻松戏谑的话语解构严肃权威的经典叙事,用革命历史、政治定论等素材编造各种真假难辨的网络热词、段子和视频,散播泛娱乐化的政治谣言,在离散人心的同时消遣权威、颠覆崇高,弱化政治认同。

(二) 谣言主题:政治性与碎片化有机嫁接

“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主题一改以往“政治挂帅”的高调,转而诉诸碎片化的网络叙事,选取社会热点、难点、争议和突发问题为主题,意图以碎片化的外在表征掩盖其内在的政治指向。一是以社会焦点问题造谣,归责政府。制谣主体针对社会焦点问题,蓄意甩锅政府。如境外

敌对势力在新冠疫情期间,从“人造病毒说”“信息隐瞒说”“操纵世卫组织说”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抹黑中国,极大地损毁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二是以社会难点问题造谣,施压政府。制谣主体就社会转型期间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难题造谣生事,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如2021年多篇以《教育部长的教改新主张: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为名的网络谣言疯传,大肆宣扬“缩短学制”“中考改革”,加剧了家长的恐慌,借机对政府施加压力。三是以社会争议性话题造谣,激化矛盾。制谣主体挑选极易煽动偏见,短时间难以求证的事件造谣滋事。如在“操场埋尸案”“西安孕妇流产”等事件尚未查证之前,就产生了大量网络政治谣言,蓄意激化矛盾。四是以突发性话题造谣,中伤官员。制谣主体利用突发性事件有意污化政府和官员。例如,谣言《云南一中学提供变质食物,食堂系县委书记岳父承包》,借食物中毒的突发事件,诽谤干部,引发官民矛盾。

(三) 谣言内容:“非真”与“逼真”交织弥漫

网络政治谣言在本质上具有“非真”的特性,但为了掩饰其虚假性,制谣主体惯于通过真假拼凑、权威加持、正义标榜、情感关怀等方式制造“逼真”的假象,使网络政治谣言的内容呈现“非真”与“逼真”交织的特征。一是真假拼凑。制谣主体通过张冠李戴、细节衍生、夸大数据、切换时空、无中生有等方式从真实的政治信息和人物中嫁接或衍生出政治谣言。如网上曾流传的“‘南京大屠杀’伤亡大部分是军人,平民是少数”“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只是‘小说概述’”等言论就是以“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之真与伤亡者身份及数量之假进行拼凑的拙作。二是权威加持。制谣主体大量使用新闻式标题、数字式举证、图片式呈现等手段,假借官方或业界权威之名,提升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影响力。如新冠疫情期间各类杜撰的“返乡公告”“某市封城”等谣言大多假借官方形式增强其“逼真”性。三是正义标榜。制谣主体善用“草根阶层”“正义立场”等形式自我标榜,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惯用二元对立的伎俩,借用“仇官”“仇腐”等标签造谣,诱导受众偏听偏信。如“凉山儿童贫困无助”的不实视频,就通过摆拍和情节设计获取了广泛关注,引起受众对脱贫摘帽政策的质疑。四是情感关怀。制谣主体打着关心和关爱等旗号,冠以“注意、警惕、小心”等字眼,制造谣言以满足网络受众的情感期待,借以构

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即使谣言被证伪,受众仍抱以宽容态度。如近年来频发的维权类谣言,就是利用受众的情感“共鸣”,达到混淆视听之目的。

(四) 谣言话语:结构化与煽动性双重发酵

结构化在此是指网络政治谣言在文本框架上惯用标题、正文、佐证和结尾等叙事结构,在行文体例上呈现相对固定的叙事风格。煽动性则是指网络政治谣言具有的影响受众情感意愿所体现的话语特性。“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融通了解构化和煽动性的话语叙事,以达蛊惑受众的目的。一是标题吸睛。网络政治谣言的标题极尽新、奇、怪、异之能事,或断章取义、或故设悬念、或夸大事实,企图引起广泛关注,促使谣言快速传播。如《不要点赞,要转发!!》《突发!!》等经常就是借助标题吸睛传谣之“杰作”。二是正文煽情。为契合“后真相”时代的认知趋向,制谣主体或改直白陈述为情感叙事,大量运用“泪目”“痛心”等词以达到“共情”的效果;或灵活使用故事元素,以故事叙事把控受众的情感;或极力借用情感预设,以平民立场、草根情结固化受众偏见,实现其制谣传谣的图谋。三是佐证直观。为了提升可信度,谣言自证也从文字言明转向图像表意,依循“有图有真相”的思维定势,借助技术移花接木,以图文并茂、视频为证等更为直观的形式进行谣言佐证,从而轻易获取受众的信任。四是结尾鼓噪。谣言结尾总是不忘首尾呼应,用夸张的言语鼓噪甚至胁迫受众传播谣言。诸如“是中国人就转”“有爱心就转”“转发后一生平安”等,看似提振国威、呼吁良知,实则是情感裹挟、道德绑架。制谣主体借用结构化和煽动性的话语方式,加速了网络政治谣言的裂变传播。

三 “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归因透视

“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绝非单纯的网络事件,其实质是一种为了实现特定政治诉求和利益,由网络技术助力,受多元力量影响,意图扰乱政治信任的政治博弈手段,是网络传播与政治耦合的产物。因此,只有从利益勾连、技术加持、治理博弈和信任流失等多重角度全面透视“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生成和发展的内在机理,才能有效把握网络政治谣言治理的方向和重点。

(一) 利益诱导:政治权力和资本利益的相互勾连

美国学者阿特休尔曾指出,媒介“向来是某种权势操纵抑或控制的工具”^①。事实上,无论是纸媒、电子媒介还是网媒都难逃政治权力和资本利益的影响和制约。政治权力和资本利益的相互勾连构成了“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生成和传播的根源。习近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证明,网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重大社会事件,从来都不是个别人一时心血来潮搞起来的,而是各路角色粉墨登场、联手行动的结果,是有选择、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②国内外敌对势力肆意炮制网络政治谣言,诋毁和攻击我国的内政外交,其最终目的是西化、分化和弱化我国政权,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此同时,少数网民和媒体罔顾事实真相,随意造谣传谣;少数平台放弃了“把关人”的职责,为最大限度地满足资本逐利的本性,奉行“流量至上”的资本逻辑,使得网络政治谣言营销等畸变现象时有发生。可见,“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生产和传播无不渗透着政治权力和资本利益的企图,制谣主体正是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扶持和资本利益的驱动下才相互勾连,借以“后真相”时代非理性情绪裹挟少数不明真相的受众,肆意造谣传谣,最大限度地实现多方的利益勾连,最终演绎出虚假新闻、次生舆论、真相反转等复杂多变的舆论乱象。

(二) 技术加持:网络技术与社交生态的双重推力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构建了多中心、扁平化的网络场域,提供了多元化、互动性的网络媒介,形成了碎片化、开放式的传播方式,塑造了社交化、共享式的传播特性,并带来海量的信息资讯,使得事实真相在信息爆炸和众声喧哗中越发隐而不显,客观上为网络政治谣言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外在的技术条件。同时,“后真相”时代移动社交媒体迅猛发展,以QQ、微信、抖音、Facebook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越来越深嵌于社会交往和群际关系之中,随之衍生的感官化体验、具象化表意、情绪化宣泄等社交生态也日益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方式,使得人们更易于接受网络圈群散播的

^①陈付龙:《公共生活的历史生成:主体性哲学视界的澄明》,《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6期。

^②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情绪、偏见和立场,甘愿沉溺于虚假新闻、八卦流言、奇闻轶事等网络信息之中,钝化了人的认知逻辑和理性,客观上也为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外部条件。一旦出现道德失范或行为失规的现象,网络技术和社交生态就存在被操控的风险,被别有用心之制谣主体肆意利用,异化为“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外在推力。

(三) 治理困境:谣言惑众与治谣祛魅的动态博弈

网络政治谣言的治理实际上是制谣主体与治谣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在信息、力量 and 影响力等方面的不对称性衍生出治谣、协同和惩治等现实困境,为网络政治谣言的生成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首先,信息的博弈产生了治谣困境。信息是网络政治谣言治理博弈的关键,掌握信息就掌握了先机。由于信息的时滞性,制谣主体与治谣主体之间存在着先天的信息不对称,加之“后真相”时代的海量信息、圈群式的嵌套传播和算法推荐等因素也使治谣主体占有、调用和控制相关信息资源的能力遭遇掣肘。这种先天性的信息不对称和后天的信息整合能力式微,构成了治谣的现实困境,为网络政治谣言的挣扎变异留下后患。其次,力量的博弈带来了协同困境。政府、媒体、平台和公众既是谣言治理的主体,同时也具有“经济人”理性,各自基于利益的考量,也可能改变博弈力量的对比。事实上,政府难以杜绝极少数公职人员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出现观望、无视甚至纵容网络谣言传播的现象,媒体、平台和公众更会面临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的策略性选择,隐性增强谣言惑众的力量。因此,这种力量博弈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必然加大各方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和价值整合的难度,带来协同共治的困境。最后,影响力的博弈加大了惩治难度。谣言信息和辟谣信息在发布者属性、时间节点、话语风格、传播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性以及谣言传播中渠道、听众、传送者等偶发因素的影响,使得双方的影响力博弈同样存在着较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大了对其影响力的科学评估难度。如何科学研判网络政治谣言影响力博弈的程度和效度,如何科学合理地对制谣传谣的各方归因定责,对治谣辟谣的各方实施嘉奖激励都构成了治谣惩治的现实难题。

(四) 信任流失:多元文化与碎片解读的潜在影响

“政治信任是指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治体系相信、托付和期待的一种政治现象。”^①良好的政治信任是阻截网络政治谣言传播和蔓延的重要屏障。但“后真相”时代多元文化的糅合共存和碎片化的解读方式加剧了民众的价值分歧,侵蚀了信任防线。一方面,复杂的利益诉求、多元的社会思潮与多样的传播方式交织叠加,催生出“后真相”时代多元的网络文化,加大了主流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和摩擦。虽然非主流文化是主流文化的有益补充,但诸如佛系文化、网红文化、躺平文化等难免有背离主流文化的消极因素,尤其是污丑文化、拜金文化等更是尽显畸形审美和金钱至上的错误思想,若不加警惕和批判,极易误导一些认知不足、阅历不够的受众,诱发政治偏见,不断冲击和侵蚀业已形成的政治信任。另一方面,“后真相”时代人们面对海量信息,惯以碎片化的方式拼凑事实、解读真相。一旦关涉社会分化、利益分配、政治腐败和政策失误等复杂的政治谣言鉴别,人们极易陷入碎片化信息的不断解读和重组,制造出多种“真相”,并借此持续发酵,非但无益于阻断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反而会频繁质疑已有政治共识,造成政治信任的流失,为谣言惑众创设了可能。

四 “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治理路径

网络政治谣言惑乱人心,激化矛盾,破坏安定,危害甚大。为此,要从澄明事实与情感的主次逻辑、强化制度和技术的协同规制、重视价值和文化的柔性沁润、坚持规则和话语的理性建构等角度,探寻“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谣言的治理路径。

(一) 拨乱反正:事实与情感的逻辑澄清

“后真相”时代存在的种种异象看似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实则陷入了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误区,使得原本作为确证客观性的事实真相面临主观性扩张的冲击,必须拨乱反正,匡正事实与情感的主次逻辑。一方面要澄明思想之乱。情感优先的立场意图以情感掩护真理的相对性,消解了真相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陷入了相对主义的

^①上官酒瑞,程竹汝:《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及其现实启示》,《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泥潭;事实无涉的态度将主观臆想凌驾于事实和真相之上,陷入“真相在心中”的唯心主义的窠臼。因而,务必警惕隐匿于“后真相”背后的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思想迷雾。另一方面要坚守精神之正。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①。网络舆论同样也要坚守客观、真实、理性的基本原则,秉持质疑、求证、务实的基本精神,站稳求真、扶正、祛邪的基本立场,始终保持理性定力,守护社会道德良知。政府要做好网络辟谣的压舱石工作,媒体和平台要发挥社会舆论稳定器的作用,广大网民要练就琐碎庸常下的火眼金睛,理性抵制网络政治谣言,为治理网络政治谣言扫清思想障碍。

(二)辟谣祛魅:制度与技术的协同规制

应对网络政治谣言治理博弈中的现实困境,亟待从预警、协同和惩治等方面强化制度和技术的协同规制,增强辟谣祛魅的实效。一要强化制谣源头的预警规制,破解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完善信息公开制度,辅以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着力提升政务信息发布的时效性、精准度和覆盖面,让网络政治谣言止于公开。持续推进网络实名制,优化网络账号管理技术,严查网络“黑账号”,整治“实名不实人”现象,让网络政治谣言止于实名。强化信息研判和预警能力,有效运用数字认证、过滤软件、Rumor Bot(谣言机器人)等技术动态监测网络舆情,引入多种识别变量,力求在第一时间分析和识别网络政治谣言,果断启动相应的辟谣治谣预案,让网络政治谣言止于狙击。二要强化制谣传谣的协同规制,破解力量不均衡的难题。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统筹社会和市场的多元力量,确保治谣的力量优势^②。明确多元主体的治谣责任,以制度遏制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现象;加大激励性制度的比重,通过专项补贴、税收优惠、服务外包等经济激励政策,激活市场力量参与治谣的动力;强化协同治理的宣传力度,动员最广泛的社会治谣力量;搭建集举报、查证、辟谣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网络治谣技术平台,整合多元治谣资源,壮大治谣力量,有效化解力量博弈的难题。三要强化责

任追究的分类惩治,破解罚过不对等的难题。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发挥技术的回溯、取证优势,综合研判网络政治谣言产生和传播中的主观原因、客观因素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程度,优化定责和惩治的标准和机制,做到罚当其罪、罚当其过、以儆效尤,切实增强制度和技术规制的约束力和威慑力。

(三)固本培元:价值与文化的柔性沁润

制度和技术的刚性规制只是治标之举,坚持价值引领和文化涵养,提升网民明辨是非、证谬美丑的能力才是固本培元之道。一方面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固本之效。习近平同志指出:“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高度凝结,有助于个体规避价值观带来的“主观性”风险,在具体利益冲突和思想偏见差异之上形成最广泛的价值共识,增进政治认同。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除了要科学澄清各种错误的价值观认识,揭示其本质,还要重点发挥情感因素的作用。坚持以情促情,以真懂真信真用的真切情感感染民众;坚持以境生情,营造向上向善向美的情境增进价值认同;坚持以行育情,在实践中强化情感共鸣和价值体验,提升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的思想和行为自觉。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文化涵养的培元之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④,充分肯定了文化培元铸魂的重要作用。治理网络政治谣言,也需要从文化层面强化对多元网络文化进行规约和引导^⑤。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坚决抵制俗文化、污文化等网络政治谣言,让有高度、有温度、有力度、有广度、有深度的网络政治文化精品充盈网络空间,净化网络生态,使网络政治谣言无处容身。

(四)激浊扬清:规则与话语的理性建构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主导国际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3页。

②刘静静,周荐:《舆情新词语与公权力形象塑造》,《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73页。

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⑤颜佳华,等《文化行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学习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

传播规则,形成西强东弱的传播格局。布迪厄等学者曾揭示:“表面上国际传播呈现一种中立态势,实则隐藏着发达国家强权式的影响和渗透。”^①事实上,现有的国际信息传播规则和秩序不但助长了旧秩序宰制者的嚣张气焰,而且持续压制新秩序倡导者的诉求,维持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动输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动防御的传播状态,导致“大国弱语”“有理难辨”“他国误解”等网络政治谣言治理的现实难题。为此,要坚持激浊扬清,竭力认清并批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及其网络渗透的各种“变形”伎俩,“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②,以消除网络政治谣言治理的重要掣肘。一要积极参与国际传播规则制定,反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诘难和攻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③。在国际信息传播领域,要“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④。要竭力破除原有国际传播中长期存在的信息、技术和传播资源的垄断格局,积极参与建构以平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传播新秩序,改变传播秩序中结构性失衡的状态,为网络政治谣言的国际治理奠定坚实的基础。二要努力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⑤。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离不开“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⑥的建构,需要建立起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易于国际社会理解和接纳的概念、范畴和话语,更好地对外阐释中国之路、中国之制和中国之理,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同时,积极鼓励学界以学术成果支撑和赋能国家政治话语,形成传播话语与学术研究的良性互动,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效能,消除各种网络政治谣言的误导误读,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思想、中国价值和中國方案的理解和认同,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

The Characterizations, Attribution Perspectives and Governance Path of Internet Political Rumors in the “Post-Truth” Era

YANG Yun-yi^{1,2} & ZHAO Xi-qun¹

(1.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aihua University, Huaihua 418000, China)

Abstract: The technological change from “paper media” to “intelligent media” and the logical change from “truth” to “emotion” have marked the arrival of the “post-truth” era. Characterized by “emotion-prior-to-truth” dissemination, it has triggered off worries, such as rationality collapse, trust weakening, and identity bias, to a certain extent. Political rumors on the Internet also form basic characterizations that result from them in terms of form, theme, content and discourse, and can invisibly breed and spread under the effect of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such as interest collaborations,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governance games, trust loss. The political rumors on the Internet in the “post-truth” era have seriously weakened the netizens’ recognition of China’s mainstream ideology. therefor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governing rumors,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logical clarification of facts and emotions, the coordinated regulation of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ies, the flexible self-restraint of values and culture, the rational construction of rules and utterance need to be adopted.

Key words: the “post-truth” era; political rumors on the internet; basic characterizations; attribution perspectives; governance path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范玉吉,王英鸽:《论传播权在建构国际传播新秩序中的应用》,《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②《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